

话语与权力: 批评话语分析对福柯的继承与发展

尤泽顺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摘要: 一般认为, 福柯的“权力”“知识”“话语”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包括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在内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福柯关于权力、知识、话语等的简要分析表明, 批评话语分析接受了前者提出的“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权力和知识互为保证”“知识、权力等都是由话语建构出来的”及“分析话语可以揭示权力的运作机制和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等观点, 并对这些观点进行相应的改造。

关键词: 福柯; 权力; 话语秩序; 批评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321(2018)04-0073-06

一般认为, 福柯的“权力”“知识”“话语”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包括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在内的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研究具有重要影响。^{[1][2]} 费尔克拉夫在谈到福柯对其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影响时, 把它们归纳为五个方面: 话语的建构性质“互语性”(interdiscursiv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首要地位(Primacy); 权力的话语性质; 话语的政治性质; 社会变化的话语性质。^[3] 其中, 他讨论最多的是福柯话语理论(尤其是福柯关于“权力”“知识”等看法)对他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观点的简要回顾, 以揭示CDA对福柯的继承与发展。

一、权力

权力是福柯社会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 是“福柯社会理论的基石, 是福柯构建社会形态的根源、归宿”^[4]。权力也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核心概念, 后者对权力的理解受到福柯的强烈影响。在传统社会行为理论中, 权力包含两个意思: 行为者自身的行为能力和支配他人的能力。然而, 不管是把权力理解为行为能力还是支配他人的能力,

人们都是以“权力是一种先在的、给定的东西”这一基本假设为基础。福柯认为, 近代以来的两种基本权力理论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式把权力看作是维护生产关系的工具, 政治权力的原因在于经济权力; 法理主义的法权模式把权力看作可以像商品一样占有, 还可以通过契约等方式转让给某人或某个组织。不管是把权力归咎于经济还是把权力视为商品, 都没能真正说明权力的本质, 都只是一种权力的经济还原论, 它只适合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 不适合现代时期。^[5] 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把世界当作上帝所著的一本书来理解, 世界的一切来自上帝, 权力也来自上帝, 由上帝作为担保。古典时期, 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认识世界的方式, 人们不再从上帝的角度来理解世界, 而是通过精确计算的方式为自然归类并认识世界, 权力来自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 由自然秩序作为担保。现代时期,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主要通过主流学科和话语的陈述来完成, 权力来自于话语的陈述, 由话语来构建。各个时期的认识之间看似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而实际上所谓的

收稿日期: 2017-03-09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话语与福建区域形象的修辞构建”(20140B070)

作者简介: 尤泽顺, 男, 福建南安人,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一致性”是一种建立在误解之上的环境,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断裂”关系。与阿尔都塞所说的“认识论”断裂有所不同的是,它们既不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线性关系,也不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关系,而是完全不同的认识框架。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由于有上帝或自然作为担保,权力是一种给定、可以转让的东西;现代时期,权力是构建的,必须用全新的方式来理解。

福柯认为,权力本身是一个“有待解释的东西”^[6],其本质就在于它的片面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需要从各个角度来解释。^[7]首先,权力不是一种物的观念,而是一种关系,因为“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8]。权力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的场,是一个流动的循环过程,它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权力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控制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网络。权力不是一种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由每个人参与而构成的网络关系,他们既是权力的运作者,也是权力的被控制者和被支配者,“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作权力”^[9]。其次,权力是无主体的。这就是说,权力是一张可以自行运作的网络,个体在其中只是权力运作的承载者,不是权力运作的主体。权力并不是像传统理解上的那样集中在某个中心,如国家机构,相反的,权力作为一种网络关系,是一种非中心的、多元的、分散的、被福柯形象地称为“毛细血管状的”关系,研究权力必须要深入到权力最局部、最边缘和最底层的地方去。权力不等同于国家机器,也不等同于统治阶级。国家不是权力的主导形式,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国家机器控制者或统治阶级也无法控制那种无所不在的权力网络,即使国家消失了、统治阶级瓦解了,社会生活层面的权力关系仍然存在,不会就此消亡。再次,权力的实施是通过协调国内不同领域、制度、行政机构和其他团体的关系来运作。由于没有公认的或可依赖的中心,各个群体必须相互协商、寻求妥协办法,才能最终促成权力的实施。“权力不应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称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10]因此,权力永远无法实现它所宣称或要做的事,它仅仅是

各方妥协的结果。再次,权力本身既没有所谓的正面效应或负面效应,而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权力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权力制造了“顺从”的身体和行为,但与此同时,权力也造就了人的“主体性”。这与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把个体招唤为主体”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福柯想说的是权力的生产性和权力的无主体性,阿尔都塞想说的是主体的存在是以意识形态的存在为先在条件的,主体化过程也是个体臣服的过程,是个体的意识形态化。

福柯的权力观对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具有直接影响。在后者的研究中,权力同样经常被视为一种关系,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多次重申,他们希望通过话语分析揭示潜藏其中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关系。首先,他们把权力看作一种给定的、与统治阶级相联系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关系。范戴克指出,权力意味着“控制”,“即一个群体(的成员)对另外一些群体(的成员)的控制。这种控制涉及行为和认知:一个权力群体不仅会限制其他群体的行为自由,也会影响他们的思想”^[11],控制主要通过认知来实现。汤普森与费尔克拉夫认为,意识形态维护和再生产了权力关系。^[12]对此,彭尼库克评论说,批评话语分析往往“把权力只与一种统治集团观念相联系”,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13]其次,批评话语分析同样把权力视为一种动态的、构建起来的关系。在话语实践中,无论是权力的主体还是个体,都是由话语构建而来的。当然,由于福柯否认权力的控制关系,强调权力的构建性质,他的权力观更多体现为一种单向的“话语构建权力”^[14]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把权力既视为给定的东西,又视为一种构建的关系,其权力观是一种双向的构建模式,权力限制话语的运用,话语实践又进一步构建权力关系。再次,批评话语分析同样把权力视为一种(竞争性的)协商过程,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话语实践过程就是权力的争夺过程,统治阶级生产(再生产)权力话语,被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权力话语进行抵制,最后,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话语,并与其共同生产新的话语。^[15]在此,权力也被视为一种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能拥有的具有再生性的关系,但是,其结果还是占统治地位阶级获得了权力的最终优势,即最终形成的权力关系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关系。

二、知识与权力

福柯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的讨论,影响了批评话语分析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一直以来,人们对知识与权力的普遍看法主要有三点:知识是获取权力的一种手段;权力是阻碍探求真理的工具,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它的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知识是破除权力压抑、实现解放的前提。^[16]其共同点是知识和权力是相互分离、相互利用又相互排斥的关系,知识可以是获取又可以是破坏权力的手段,权力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发展。福柯对此表示反对,他指出,知识和权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密不可分的再生关系。“我们也许应当抛弃这样的信念:权力造就癫狂,同理,权力的放弃是知识的条件之一。我们倒应当承认:权力产生知识(这不单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而鼓励它,或是由于知识有用而应用它);权力和知识正好是互相蕴含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力关系。”^[17]知识和权力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互为结果。

福柯强调,要理解知识与权力这种共生关系,必须从人理解世界方式的历史变化来观察。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是不一样的,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建立的有关世界的知识是一种“认识型”(epistemic)知识,它是“某种组织原则的产物。这些组织原则通过把事物分类并赋予它们意义和价值将事物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决定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事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以及我们要说些什么”^[18]。这些原则往往以一种隐含的、不为人所觉察的或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形式存在,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也可以说限制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认识型”主要有三个阶段: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不同认识型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从一个认识型到另一个认识型并没有自然关联,也没有任何线性的进步或发展,而是不同的认识框架。也就是说,知识只是在不同认识型基础上构建出来的东西,所谓的“永恒的知识”其实是一种幻觉。

知识认识型转换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权力的运作方式发生根本的改变。文艺复兴及之前,权力的运作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代表上帝的国王或女王手中独有的东西,其他人的权力都必须由他们来赋予,个人不能自动拥有权力。随着自然科学

的发展,上帝的地位被通过“精准计算”获得的“自然真理”所代替,权力的运作则取决于掌握“自然真理”的多寡。对此,福柯指出,17世纪以前,“……权力运作的方式在其本质上是可以用‘君主—臣民’的关系来定义的。但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出现或创造”^[19]。现代时期,随着“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的发展,权力运作是以主导学科和话语的陈述为基础,人是否正常不再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以他们是否和魔鬼相似作为判断标准,也不再像古典时期那样借助于“测量表”来区分,而是以学科话语和文本提供的逻辑和思维模式为依据;对学科话语的掌握就意味着获得权力实施的保证,也意味着对他人权力实施的限制。比如,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性是一种禁忌语,人们在性问题上缄默不语,然而,当时却存在一大批机构和学科,出产大量与性有关的知识,这些性知识实际上为探求人类真理提供了途径。“因为在那个时代,从观察、记录、证词、忏悔中收集来的知识开始向真理转移……那些已经进入我们日常语言的类别词汇,如同性恋者、性冷淡的女人、女色情狂或者歇斯底里症患者……和它们的症状被当作‘条件’用以区分‘正常的健康的’人和‘不正常的变态的’人,后者是需要受诸如外科手术、电疗、分析等治疗的。”^[20]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也以此为依据,规定什么是健康正常的,什么是变态不正常的。

对于现代时期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方式,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也持有类似观点。不过,批评话语分析对知识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那些占据主流地位并逐渐成为社会共同接受和采纳的知识,简单地说就是“基于社会标准、为社会共享或共同接受的一种信念”^[21],这种信念为权力的实施提供了合法化的途径。比如,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主流话语劝说、掩饰和操纵等策略来塑造他人的思想,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断声明,精英阶层在制定计划、做出决策和对权力实施的关系和过程进行控制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这些观点一旦为他人所接受,就成为一种社会共享知识,支配着社会的权力运作。因此,当国家总统或政府首脑代表一个国家对他国宣战时,民众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共享知识”使他们相信总统或政府首脑有这样的权力;相反的,一个平民做同样的事只会被认为是“疯

子”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力。在此情况下,权力得以运作是因为主流话语成为大家共同接受和使用的语言,而权力的事实又加强主流话语的地位。另一个方面是那些仅掌握在少数专业人士手中的专业知识。比如,医生可以给病人看病,因为医生掌握了有关疾病治疗的知识,他有能力也有权力给别人看病,其他人没有这种权力。与前一个例子不同的是,医生有权治病的首要保证并不是因为民众的“共有知识”,而是因为医生掌握了有关疾病的专业知识,即福柯所说的学科话语和文本提供的逻辑和思维模式。这说明,此时共有知识在为权力实施提供保证的过程中只是一种必要条件,但掌握某种学科的专业知识是它的核心条件。当然,不管是共有知识还是专业知识,其实质都是为权力实施提供合法途径,而一旦权力得以实施,它将反过来加强知识的作用,为权力的进一步实施创造条件。从范戴克^[22]的研究来看,他关注的主要是共有知识(也就是他后来一直强调的语境[context]),尤其是共有知识如何在认知上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促进权力的实施。沃达克关于医疗话语的研究^[23]关注的主要是后一种知识,即专业知识(医学知识)与权力实施之间如何互为保证。

三、话语/话语秩序

福柯影响批评话语分析的第三个重要观点是话语/话语秩序对社会权力关系的建构作用,即权力关系及权力与知识的结合是通过话语的使用来实现的。在福柯之前的多数研究一直坚持“工具性”观点,把话语看成知识传播者的产品与交流工具。福柯认为,权力、知识与话语之间是一种同构关系,权力、知识由话语来实现,话语既是权力、知识的产物,又构成权力和知识。“……话语远非一透明或中性的环境,性在其中可被绥靖而政治得以安抚,相反,它实际却是性和政治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来行使它们非常可怕的力量场所之一……话语并非仅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因而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24]当然,福柯所说的话语既不是作为整体的抽象语言系统,也不是一个语篇或者一组符号,而是语言的个体行为,或者说是在行动中的语言,是“作为一种表述系统的话语”。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陈述,话语由彼此关联的陈述构成,它们共享某种空间和语境,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谈论某一特定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者表述方式,

同时它们还能生成新的东西(如一句话、一个概念或一种效果)。具体来说就是,话语“是表达一个机构的意义和价值观的一套有组织的系统性的‘陈述’……一种话语提供一套关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可能的陈述,组织并构造谈论某一特定话题、对象、过程的方式。它为社会和个人行为做出描述、规定、许可和限制”^[25]。在陈述过程中,话题、对象、过程被构建,个人行为被限制,就是话语主体本身也是由陈述构建出来的。

传统观念认为,人是话语的主体,是独立的施事者,话语是人的行为对象,主体生产了话语,但话语却不能对主体产生丝毫的反作用。福柯的话语理论颠覆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表面上看是主体生产了话语,实际上却是话语造就了主体,即“你以为你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语言是人类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人们不仅用语言向别人解释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也用语言进行自我解释,同时,人们也是通过语言才了解别人的想法。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它是一种行动中的语言,在使用语言进行解释或理解世界时,人们实际上也形成了对自我的了解及自己赖以判断价值、真假和正误的能力,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话语的影响、规范和制约。^[26]

话语造就主体性的过程实际上还构建了各种社会和文化领域,这些领域反过来帮助明确话语的主体位置。一般认为,领域是人们以某种方式加以利用的一个领地或者社会中的一个空间,它具有自己的规则和程序,分派给不同主体以不同任务与职位,规定了特定的行为和语言,建立了特殊的等级制度。人们进入该领域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该领域的程序,人的主体性随着他在该领域占据某一位置凸显出来,并随着领域的运作而不断受到塑造,领域也因为人的参与而不断发生变化。主体性与领域之间是一种互为建构的关系,两者的互动是借助于话语这个“领域”的自我“表达”手段才得以实现的。福柯希望能描绘出话语场,在此基础上找出话语各种具体形态之间的关系,揭示话语陈述之间的联系如何比事物本身在事物形成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此,他想表明的是,事物(包括人对自身的理解)最终的形成主要不在于人是否看到或知道它,而在于话语如何对它进行陈述以及各种陈述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塑造出事物的形象,甚至有些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比如,某个新的领域及其规范)也可

以在话语的陈述中逐步构建出来,并为人们所接受。话语及其陈述构建事物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持续的相互作用的话语实践过程,即整个过程可以看作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又可再分为不同的话语阶段,福柯将它们称为话语事件,因为它们就像是一个个事件,分别在特定的时刻出现,有一定的先后顺序。每个话语事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整个话语构成都具有塑造作用,有时甚至对话语场外的其他问题都有影响。可以说话语作为一个整体,在福柯看来其实是陈述之间的联系或表述系统,话语事件是各个具体陈述所表达的具体物质对象,而话语实践表明的是话语使用过程,即陈述如何表达对象以及陈述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建构出话语场及场中的事物。那些能够被定义出来的陈述及其关系实际上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构成”(discourse formation)。上述的话语、话语实践、话语事件与话语构成等之间的联系与界限形成一整套话语生成机制,被福柯称为“话语秩序”,它与社会领域联系紧密。按照费尔克拉夫的理解,它是“话语层面上的社会秩序,是社会文化实践在话语上的历史印记”^[27]。

不仅如此,话语还构建了制度和真理,后两者同样反过来帮助确立主体的位置。制度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与人及人与物之间相对持久和稳定的关系集合。”^[28]它既包括我们常见的机构(如学校、政府部门、组织等),也包括机构中的各种关系(如师生关系、上下属关系、同事关系等),既存在于公共领域,也存在于私人领域。当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存在差别,比如公共领域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不过,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真理”观念和“真理影响力”的不同,公共机构更具权威性,这来源于它们有能力说出某些情况的“真相”^[29],即它们所提供的“真相”更具有可信度,也更具影响力。在指出公共机构依靠自己讲述的真理赋予自己行动的权威性时,福柯也指出,人们不要过于相信它们所说的真理。事实上,对真理的声明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真理游戏”,它是由话语实践和制度构建出来的。真理游戏是“一组导致某个结果的程序,从这组程序的原理和规则判断,它可能站得住脚,也可能站不住脚”,或者说,它就是“一条制造真理的规则”。^[30]这意味着,所谓的“真理”其实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运用话语并借助一定的规则构建出来的东西,真理和谬误本质

上并没有多大区别,它们只不过是话语根据同一条规则构建出来的不同结果而已。

福柯关于话语/话语秩序的讨论对批评话语分析具有直接而广泛的影响。首先,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的“话语”“话语秩序”“话语实践”“话语过程”“话语构成”等术语就是直接从福柯的话语理论移植过来的。虽然“话语”一词在语言学研究早就存在,并且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是,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和柏瑟斯(Pêcheux)等人在使用话语一词时,他们的理解实际上是以福柯的话语理论为基础,同时把语言学研究中的话语概念嵌入其中,形成一个组合型的话语概念。对他们来说,话语是一种以语言使用为中心,又包含语言之外东西的集合体,这与福柯理解的“话语是一组陈述及陈述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话语还是一个多层次的集合体,在不同层次上与不同的对象发生联系;话语是一个由不同话语实践构成的过程,是一种社会过程;话语是社会结构在话语层面上的体现等。其次,批评话语分析坚持的“话语是动态的和建构性的”及“话语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等观点,就来源于福柯提出的“权力、知识、制度、真理乃至话语的主体都是由话语构建出来的”。不管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还是功能语言学,都是把语言当作一种静态的对象进行研究,批评话语分析借鉴了福柯的观点,把语言视为一个动态系统;不仅如此,它们还超越语言系统本身及福柯话语单向构建社会现实的观点,把语言使用与社会变迁视为一种相互构建的关系,使语言学研究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乃至政治实践意义。当然,批评话语分析对于福柯的部分观点也有所保留,比如,他们并不认为知识和真理都是构建出来的,虽然他们对人文研究中的科学客观主义没有好感,但是,他们并不否认分析研究过程的科学性,特别是现在的很多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实践,都尝试采用语料和定量数据分析等被认为比较“客观”的方法作为辅助手段。再次,批评话语分析坚持通过分析话语来揭示话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做法,与福柯对话语构成的描述具有相似之处。不过,福柯分析的对象不是具体的语言使用,而是话语陈述和陈述之间的联系,其目的是为了描述和揭示陈述及其联系如何构建出对象;批评话语分析的对象主要是具体的语言使用,在此基础上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也纳入其分析范围。也

就是说,福柯的分析主要是一种宏观的描述,批评话语分析的重点是微观分析,同时结合宏观语境进行解释。复次,批评话语分析的许多研究方法受到福柯研究方法的启发。批评话语分析虽然关注的重点是微观层面的语言使用,但是它研究语言的许多方法和过程却受到福柯的影响。比如,费尔克拉夫与沃达克都强调运用语言分析(如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分析)来研究语篇,费尔克拉夫注重揭示语篇的生成及再生产机制和过程,以及语篇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沃达克侧重于分析话语的历史形成过程,即一种话语如何生产出来、如何最终成为大家都接受的话语并不断在新的语境中被表达和重构。可以说,费尔克拉夫的后结构(Poststructuralist analysis)分析主要借鉴了福柯的

“谱系学分析”,注重语言表层、细节、微小转换以及细微轮廓的外现,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主要借鉴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注重挖掘话语的历史起源和形成过程,通过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的分析从深层次上揭示特定话语的本质和根源。

四、结论

福柯对知识、权力和话语及它们之间关系等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指出权力不是物,而是一种关系,权力和知识互为保证,知识、权力等都是由话语建构出来的,分析话语可以揭示权力的运作机制和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这些观点被批评话语分析大量吸收,并进行相应改造,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

注释:

- [1] S. Titscher, M. Meyer, R. Wodak and E. Vetter, *Methods of 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rans by B. Jenner, London: Sage, 2000, p.144.
- [2] 辛斌《福柯的权力论与批评性语篇分析》,《外语学刊》2006年第2期。
- [3] 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p.55-56.
- [4][5][7] 陈炳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94、95-96、98-104页。
- [6] M.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New York: Semiotext, 1991, p.144.
- [8][9][10][16]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樱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9年,第27-29、28、28、12页。
- [11] T. van Dij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and H. Hamilton (eds.),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2001, p.302.
- [12] 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1989, pp.2-3.
- [13] A. Pennycook, *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p.90.
- [14] 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1989, p.60.
- [15] T. van Dijk,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society”, in D. Crowley and D. Mitchell (eds.),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3, pp.110-122.
- [17] 谢里登《求真意志:米歇尔·福柯的新路历程》,尚志英、许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 [18][20][26][28][29] 丹那赫等著《理解福柯》,刘谨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0、29-30、36-37、42、43页。
- [19] M.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80, p.104.
- [21] T. van Dijk, “Discourse, knowledge and ideology: Reformulating old questions and proposing some new solution”, in M. Pütz, J. Aertselaer and T. van Dijk (eds.), *Communicating Ideologie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Discourse, and Social Practice*,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4, p.11.
- [22] T. van Dijk,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3] R. Wodak, *Disorders of Discourse*, London: Longman, 1996.
- [24] 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载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 [25] G. Kress, “Ideological structure in discourse”, in T. van Dijk (ed.),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vol. 4)*,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5, pp.27-42.
- [27] 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1989, p.10.
- [30] Foucault, M.,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297.

[责任编辑:石雪梅]